

鱼尾的起源

何远景

鱼尾是线装书中经常出现的特殊图形，它一般位版心的中部上端，与版框的距离约为栏线的四分之一。鱼尾的形式多样，有黑鱼尾、白鱼尾、花鱼尾、线鱼尾之分，但其基本结构均为两个左右对称的全等直角三角形。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与版框栏线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另一条直角边垂直于栏线并且与另一直角三角形的对称锐角相连。这一图形看起来很象鱼类动物的尾鳍，故被称为“鱼尾”。

1. 鱼尾非为折页

一个类似鱼类动物尾鳍的图形出现在古籍的版面上，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，但它在线装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大家对它已经熟视无睹，见怪不怪了。虽然尚未见到对鱼尾的专门研究，但许多介绍古籍知识的书都把它解释为折迭书面的标志。古籍界的这种流行观点有一定的道理，鱼尾左右两个直角三角形的连接点位于版心的中缝处，以鱼尾两个三角形的连接点画一条与界栏平行的直线，可将古籍版面分为大小相同的两个部分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版心的鱼尾可以起到折页标志的作用，是无庸置疑的事实，但据此进一步认为设计鱼尾的最初意图也是为了折页，却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。

将一个平面一分为二，需要一条线段，仅凭一个点根本无法分割平面。如果要将书面对折，就不能仅仅确定一个点，而是要确定一条中线。几何学知识告诉我们，确定一条直线至少需要两个点。古籍版心中鱼尾多少不等，但以单鱼尾居多，在一个鱼尾的情况下，只能确定一个点，无法确定直线。单鱼尾不能确定版面中线，也就起不到折页基点的作用。如果鱼尾的设计目的意在折页，版心就应该设计两个鱼尾。古籍中虽然双鱼尾版式不在少数，但无法解释大多数版心只有一个鱼尾的现象。除了单、双鱼尾之外，古籍版心中还有两个以上鱼尾的版式，如元大德信州路儒学刻本《北史》^①，就有三个鱼尾。鱼尾多者甚至可达6个，如崇祯十年车应魁所刻的《瑞世良英》^②。以鱼尾为基点折页，两个已足，如果多于两个，很难保证它们都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而无法确定中线。

鱼尾并非仅仅出现在版心处，明嘉靖以前刻本卷首部分的版心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鱼尾，如宋万卷堂刻本《新编近时十便良方》的方目之上^③，元刻本《梨园按试府新声》卷端第二行“饮饌类”之上^④，这些地方都有鱼尾。这些鱼尾位于版心之外的左右版面上，鱼尾远离版心可以说和中缝没有一点关系，与折页风牛马不相及。

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前，古籍均为单面印刷，单面印刷的册页装就必须折页。鱼尾在古籍版面上虽然普遍存在，但有些书并没有鱼尾。初期的蝴蝶装的版面无版心，自然也就没有鱼尾。线装书盛行之后，虽然雕板书的版面绝大多数都有了版心，其中的某些书有版心却无鱼尾，如宋刻本《礼记注》^⑤。有版心而无鱼尾之书在宋刻本中极为罕见，在明末刻本中却非常流行。版心虽无鱼尾，书页却是一定要折的，如果鱼尾是折页的基点，它就是古籍版面中不可或缺的标志，版心中就不应该没有鱼尾。

既然册页装古籍必须折页，版面上确实应该设计一个为这道

工序提供可确定以中线依据的标志。如果为此目的设计标志，与其画鱼尾还不如直接在版心中央刻上一条直线。我们知道，宋刻本有许多是细黑口，所谓黑口即象鼻处的中线，无鱼尾之书，版心上下也常有这两道中线，这两条中线，作为折页标志，要比鱼尾方便得多，何必再设计一个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鱼尾。

很明显，在版面上设计鱼尾图形的最初目的绝不是为了取中折页。

2. 鱼尾起源于编绳契口

在雕板印刷术发明之前，中国书史还经历了漫长的简牍时代和纸写本卷轴时代，简牍时代的书籍体制在许多方面都被后来的雕板书承袭。有的学者早已提出，“后世有人称宋版书，特别是北宋刻书，小题在上，大题在下，其实仍是这种简册书籍的流风余韵”。^⑥刻本版面上的界栏也是对简牍时代狭长条状单简的模枋^⑦。鱼尾的最初设计目的既然不在于取中折页，它的起源也应该在简牍制度中寻找。

竹木简书籍是用绳子将单简编连在一起的。“刮削以后，编联以前，可能还有一道手续（编绳）……凡编绳之处于其棱上刻有极小的三角形的契口，用以固定编绳，使其不至于脱落或上下动”^⑧。对于竹木简上这类契口的形制，《包山楚简》一书谈得较为详细清楚：

竹简黄面一侧的边缘，大部分刻有一到二个或三个直角三角形的小契口，用以固定编联竹简的丝线。极少数竹简未见契口。契口长 0.3~0.5 厘米，口宽 0.2 厘米左右，深 0.1~0.2 厘米不等。^⑨

竹木简上的这种用以固定编绳的小直角三角形，如果对称相连，就是一个鱼尾。乍看起来，刻本版面上的鱼尾与竹木简上的鱼尾尚有一定的距离，一般说来，鱼尾上的三角形要比契口大得

多。雕板印刷工艺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，唐咸通九年刊刻的《金刚经》其雕板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且远非刊刻之源，而传世古籍中北宋刻本已属凤毛麟角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鱼尾，其形制已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。它与竹木简上的契口不尽相同并不奇怪。尽管如此，现在某些早期刻本的鱼尾仍然残存竹木简上契口的遗意，例如，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《文粹》^⑩、宋绍兴两浙路茶盐司刻本《唐书》^⑪，这两部书的鱼尾都很小，与契口的大小很接近。与契口形制最为接近者当为宋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《资治通鉴》的鱼尾^⑫。《中国版刻综录》展示了该书鱼尾右半部分的形状，仅为鱼尾的一半。从这一半看它与一般鱼尾就有显著的不同之处：一般鱼尾，尤其是早期刻本中鱼尾多作黑鱼尾，黑鱼尾在木板上为阳文凸刻，契口在竹木简上是向下凹刻，方向正好相反，《资治通鉴》的鱼尾作阴文白色，在刻板上为向下凹刻与契口的雕刻方向相同；鱼尾作阴文白色者也很常见，那就是白鱼尾，白鱼尾周围是细黑线，而《资治通鉴》鱼尾的周围却是未经加工的原始版面；另外，《资治通鉴》的鱼尾右半部分是以界栏为底边的等边锐角三角形，不与左半部对称的锐角三角形相连。与契口更为相近。与这一鱼尾形式相近的还有《东国李相国集》卷11第11与第12页的鱼尾，它们中间也不相连。《东国李相国集》的刊刻时间可能较晚，在这本书中出现与契口形制相近的鱼尾，应该是版刻史上的返祖现象。这类两个三角形不相连的鱼尾，是它脱胎于契口的最好的例证。

3. 鱼尾与检索文字

书籍中并非所有的文字都是逐字阅读的对象，有些文字只是帮助读者进行文献检索的辅助工具，例如书名、篇名、章节名、卷次、页码等等。这些仅供查询的文字可称之为“检索文字”。

检索文字出现得很早，简牍中就有。李致忠先生曾谈到，由

于“古人写书常以篇为单位，而用书的人也常常需要查找篇名……所以古人很看重篇名”^⑬。简牍时代书籍总量不大，而体积却十分庞大，篇名的检索作用比书名更为重要，因此简牍书经常题有篇名和篇次，如武威出土的木简本《仪礼》，位置则在第一简和第二简背面的“第二道编绳之下”^⑭。

汉代文献记载编简用两道编绳^⑮，从出土实物看，简册的编绳虽多为两道，但也有多于两道者，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。其实，文献所云只是编绳的基本形式。道理很简单，在平面上确定一条直线两个点就足够了。展开的简册是一个平面，每根单简相当于这一平面的一条直线，要使单简不在这个平面上移动，至少要有两道编绳。两道编绳一般各在距离上下简端四分之一左右的位置上，与鱼尾在版心上的位置相同。篇名和篇次题在两道编绳之间紧靠上编绳的地方。武威汉简本《仪礼》由于简比较长又在上下简端各加了两道编绳，篇名和篇次题在第二道编绳之下，第二道编绳其实还是在距离简端四分之一左右的地方，也就是鱼尾在版心上的位置。

简牍时代，篇名和篇次题在距离简端四分之一左右的篇绳之下。竹木简编绳处刻有契口，事实上，篇名和篇次是写在契口之下。宋元刻本版心鱼尾之下均刻书名、卷次，有时版心会出现两个顺鱼尾^⑯，如果是双顺鱼尾，就在上鱼尾之下刻书名、卷次，在下鱼尾之下刻页码，如宋开禧三年昆山县斋刻《昆山杂咏》^⑰。上文所举的鱼尾出现在版心之外端的例子，它们下面所刻的均也为篇名。无论书名、篇名，还是篇次、卷次、页码都不是书籍正文内容，把它们写在书上，目的在于提供检索书籍内容的文字标志。简牍时期的检索文字——篇名、篇次题于契口之下，时间一长，人们耳濡目染，就把契口与检索文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这两者浑然一体。书籍刊刻制度由简牍时期进入雕板时期，仍然少不了检索文字。由于检索文字长期出现在契口之下，已

经成为一个固定组合，检索文字在雕版书上单独出现，有悖于人们长期形成的视觉习惯，看起来总觉得缺点什么。雕板印刷的结果是书页平面，在这个平面上不可能刻出一个契口来，于是就要在检索文字之上原来契口位置设计一个与契口类似的图形，于是鱼尾就产生了。由于去古较远，明中期之后，简牍旧制与鱼尾的起源已为人所淡忘，于是出现了书名刻于鱼尾之上的版式，但鱼尾之下仍刻有篇名、卷次和页码。

4. 鱼尾——检索文字提示符

简牍时代的契口有实实在在的作用，它可以固定编绳，雕版时代的鱼尾却没有这种物理性能，只不过是对契口的简单模仿而已，简牍时代契口与检索文字的固定组合，到了雕版时代变为鱼尾与检索文字的固定组合。这两者的固定组合一但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，本来没有实际作用的鱼尾逐渐产生出设计者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检索文字要充分发挥其为读者指示路径的作用，就应该使其从一般正文中突出出来。鱼尾经常出现在检索文字之上，这一特殊图形可以引起读者对其下方检索文字的注意，正好可以起到增强其检索功能的作用。鱼尾具备了这一功能之后，就不再是对契口的简单模仿，已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。鱼尾一旦成为检索文字提示符，它在版面上位置也就不再局限于版心，所以宋元刻本中，在版心之外的版面上也经常可以看到鱼尾以及它的各种变形，用以提示其下的检索文字。

简牍时代的契口演变为雕版时代的检索文字提示符——鱼尾之后，并没有停止其演变历程。无须论证，人们很容易看出『 』与鱼尾之间的联系，如果熟悉线鱼尾的形制，要理解《 》号的来源也不困难。可见契口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仍有一定的影响。

注：

①北京图书馆：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60年版，图版306。

②张秀民，《中国印刷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516页

③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232。

④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323。

⑤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97。

⑥李致忠：《中国古代书籍史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153页。

⑦冀亚平：《唐以前手写纸书边栏界行用笔考》，《北京图书馆通讯》，1986年，第54期。

⑧甘肃省博物馆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武威汉简》文物出版社，1964年版，第57页。

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：《包山二号楚墓简牍概述》，《包山楚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版。

⑩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9。

⑪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74。

⑫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75。

⑬李致忠：《中国古代书籍史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153页。

⑭甘肃省博物馆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武威汉简》文物出版社，1964年版，第64页。甲、乙本木简俱有篇题和篇次，都写在木简的背面第二道编绳之下。篇题在第二简背，篇次在第一简背，如《士相见之礼》，第一简背书“第三”，第二简背书“士相见之礼”，“第”与“士”之上各有一个小圆点，此小点距简端1.9厘米；《服传》第一简背书“第八”、第二简背书“服传”，无小点，上端距简端19.5厘米，篇题和篇次在背面并列，乙本亦同。但《燕礼》第一简背书“燕礼第十三”，不分别书在两简背。

⑮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“册”字下云：“象其札一长一短，中有二编之形”蔡邕《独断》卷上：“策者，简也。礼曰，不满百丈不书于策。其制长二尺，短者半之，其次一长一短，两编。”

⑯两个鱼尾尾翼同时向下，方向相同者称为顺鱼尾。

⑰《中国版刻综录》，图版116~117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内蒙古图书馆